

巩县文史资料第二辑

目 录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崔济民 (1)
回忆1944—1945年皮徐支队在豫西活动的情况 ····· 史向生口述 梁清文整理 (12)	
民初河南革命片断 ···· 记刘觉民·····	王北方 (42)
辛亥革命开封首义巩县三烈士·····	县志总编室 (51)
记先父阎作霖事略·····	阎培元 (56)
冯玉祥主豫期间的放足、倒神运动·····	陈华策 (58)
关于镇嵩军 十五军的前前后后·····	谷国泰 (63)
巩县陈君灼三墓志铭·····	胡石青 (77)
记先父陈灼三二、三事·····	陈浴春 (81)
回忆先父李显白·····	李秀歧 (85)
炮打干沟寨·····	魏绍孔 (91)
李长太被反动军队剿家记·····	刘庆昭 (100)
警逢仁的壮丁苦·····	李秀歧 (104)
十区联师蒙难记·····	姜伯川 薄芝岩 (108)
建国前巩县社会上的形形色色·····	陈华策 (112)

我参加革命的回忆

崔 济 民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我是巩县人，十几岁就外出了，不仅县里情况不熟悉，就连村里的情况也不熟悉了。

廿年代初，我在学校读书，康午生（即王国权）比我高一届。我的班主任叫陈铁峰，汜水人，后来北伐军贺龙廿五军到郑州后，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

我家里穷，十二岁即停学，除在家帮助种田以外，或赶个小驴驮煤卖煤。上南山口、鹅庄、东山、夹津口一带，那时孝义有小煤厂，脚力是一分一斤，每月驮三四次煤，能赚上几毛钱。那时我个子小，煤布袋都搭不到驴身上。

十五岁时，即1927年，北伐军到了河南，陈铁峰介绍我到郑州冯玉祥的西北军。西北军的党代表是刘伯建，后来才知道他是刘伯承的哥哥。通过刘伯建介绍，到武汉我们党办的农民运动干校学习，可是我到武汉后，正赶上“四·一二”后汪精卫叛变。教育团、警卫团（后来知道林彪在警卫团）以及叶挺、贺龙把队伍都拉到南昌，暴动嘛！这时国民党就抓共产党。我原在旅馆住，开始还有人管，后来就没人

管了。干校未住成，路费也花完了，无奈何就在张发奎的部队，独立第二师当兵。我个子小，还没有步枪高，先当了勤务兵，后当上二等兵（叶挺原是独立团，打下武昌后改编为十五师）。那时兵还分上等兵，一等兵，二等兵也是三等九级嘛！当兵不久就二次北伐，去打东北军张作霖、张宗昌了。我们从武汉到信阳，住一段后到郑州，坐火车到商丘，又到鱼台、济宁、泰安，在泰安就和张宗昌的老毛子打起来了。张那时是山东督军，他的几个旅都是十月革命后逃到我国的白俄，我们叫他们是“老毛子”。攻鱼台城打一仗，就到泰安打，泰安打的比较厉害。以后到济南没有怎么打，张宗昌就跑了。后来一直到天津、唐山、秦皇岛。那时独立二师归唐生智指挥，我们从秦皇岛回到唐山，东北军就投降了，也打起了青天白日旗。

1929年，河南省主席是鹿钟麟，以后换韩复矩。我们从唐山开到河南商丘，就是要打韩复矩。在商丘住一两月，韩就投蒋介石了。后又到黑石关打庞炳勋，就是庞瘸子嘛！是西北军一个军长。西北军的概念是冯玉祥、杨虎城的军队，常驻西北嘛！庞炳勋打跑后，我们就住在巩县城。大概是1929年的夏天七八月份，这时我已当了班长。我们连长是四川人，是保定系的。那个部队分黄埔系和保定系。我是行伍出身，什么系也不是，当班长一年多了，打仗也比较勇敢，就是当不了官。那时候谁也不知道我是巩县人。就住在我读过书的那个学校。那时老城只有一个高小，以后王国权、康学孔上学时就搬到鳌岭了。我在时房子还没盖好。

我住在那学校里，我就不出操。我当的是四班长，部队一、四、七班长是中士，其余班长是下士，文书是上士，事务长算是准尉。我们连长对待士兵态度比较好，经济比较公开。我是怕见熟人才装病的。他来看我，问我是什么病，我不给他说我是巩县人，因为说了，他要防止我开小差。那时只另外一个班长知道我是巩县人，还劝我回家看一看。后来是他帮助我到连长那里请个假。连长看我时说：“他的病怎么样？如果没有什么，就回家看看吧！”那时我确实想开小差。但我有虚荣心。认为当了三年兵还是丘八老爷，怪丢人。所以我说：“不回家。”

后来唐生智在河南成立了护党救国军，就在漯河、许昌一带跟蒋介石打起来了。独立二师是广州部队，想趁机拉到广东去。想从登封、汝南、卢氏、南阳、老河口再拉到湖南老家。从巩县到登封，路过申沟的那一天，我串连五班长张金升等十六个河南、山东、河北一带的兵准备开小差。就在登封西南大金店于石河里露营时，早上四时起来，五更开饭，正乱的时候，向西跑到少林寺南边，把枪和子弹扔到山沟里，换上便衣就走了。过少林寺到萼岭口，到参家店，又到回郭镇吃饭后就分散了。跟着我回家的五、六个人，有张金升，还有灵宝的李保玉，他是我们班的兵，后来听说在八路军当营长，作战时牺牲了。

回家后七、八月间就任在本村小学教书。半年后碰见我上小学时的老师齐建涵，是本村人，他那时在西北军吉鸿昌军部当政训处长，相当于我们的政治处，对士兵进行政治教育，对

群众作政治宣传。西北军在群众中的印象还是不错的。我告诉齐不想教书了，他就带我到新军政训处当文书，抄抄写写叫师爷。接着蒋、冯、阎在河南，豫东一带混战，阎锡山败后，吉鸿昌所部归蒋介石部队领导。那时我们驻郑州，后到周口，住了两三个月，即1930年的9至11月，混战结束就开始了红军的第一次围剿，现在电影《吉鸿昌》中演吉到苏区去，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到了罗山与湖北宣化店交界处。吉鸿昌部队党的基础比较强，我们政训处五个人，三个共产党员。我是在那里开始懂得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他们介绍给我一些书，我在政治上才算开展一些。

我们处处长不是共产党员。其中徐廷光（杞县人），关治国、李××都是共产党员。还有个关周光也叫关周山，现在是三门峡市的政协常委，他是1927年的党员。是太原第一中学学生。那时候我们对社会不满，经常发牢骚，一发牢骚就讲如何改造这个社会。

吉鸿昌到宣化店后，他的秘书李子纯（河南西华人），政训处少校科员陈华宇都是共产党员，陈还留过日，那时吉鸿昌对蒋是不满的，投蒋是为保存实力。他给红军很多枪支子弹，奉蒋令剿共，他不打，即是打，也是冲天打。他是1933年被蒋撤职后在上海由周总理介绍入党的。

我在苏区，看到不少小册子《什么是共产主义》、《唯物辩证法入门》等。白天不敢看，晚上拿出来看，一直在大别山转。1931年住在湖北的宋铺镇，现叫新州县，那时属麻城县，十月我在那里入的党。我的介绍人是范德华，以后叫

谷仿玉。他是1934年在小禹州被捕牺牲的。吉鸿昌是1932年因剿共不力被撤职的。在那以前，李子纯、陈华宇就发展一批党员，巩固部队党的基础。吉鸿昌被撤职以后，就开展经济上反“伙食尾巴”斗争。“伙食尾巴”是指那时候二等兵发饷七元五，一等兵发八元五，上士十五元，那时我拿二十五元叫录士，比司书高一级，象是准尉了。当士兵发饷，连长扣这费那费，发到士兵手里只几毛钱。我就组织士兵，反对喝兵血。通过这样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为了工作方便，我就从师里到连里去了，到连里当文书。后来觉得连里面太窄，不能来回跑，就到营里当录士。那时一个营有三个步兵连和一个机枪连，我还可以与其他营接触。

吉鸿昌在部队威信很高，被撤了职，大家很不满意。尤其是蒋介石对杂牌队伍的态度，加上宁都暴动的影响，我们准备组织五个营暴动。领导宁都暴动的军长是董振堂，赵督升是党的负责人，还有赵国胜等。这一个军还有个手枪旅，旅长叫季振鹏，是冯玉祥的手枪旅，他的装备是很强的。手枪也叫驳壳枪，和步枪，大刀合称“三大件”。暴动后董振堂改为红五军，是毛主席诗词上提到的那个董振堂。董在西北军做过军官学校校长，吉鸿昌部队的营长、团长很多跟他念过书，所以董的暴动对西北军影响很大。

那时我受胡清瑞同志领导，她是女上尉参谋，是省委派来的，后来她是河南省委的军委书记。我们准备暴动的地点是湖北省麻城县北边卅五里的骑龙铺，因为泄密，没有成功。有一个党员排长姓李，是商水县周口人，他和团附是亲

戒；在一块喝酒，喝到晚上十一、二点，喝多了，就发牢骚说蒋介石排除异己，拉我们打共产党，实际是借刀杀人；对杂牌军怎么不平等，这团附也表示对蒋不满。这排长想作他的工作，就说：“我们要抗日，不能打红军，中国人不能打中国人”。又谈到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时说：“蒋介石没有办法，我们有办法。”参加喝酒的另一个党员赵金镛，是一个连的文书，连夜跑到我那里报告。当时分析这个团附比较反动，是既反蒋又反共的上层军官。我立即上山坡看有无动静。等到天亮，部队正常出操没啥事，就到旅部找胡清瑞请示。她说：“你赶快离开吧！回河南省委去，不然出了事，好多人都受影响。”那时党内都是单线联系，互相不认识。谁是党的负责人，党员都不知道。怕有的党员不可靠，叛变就危险了。她给我写了介绍信，我借了几十块钱，借口进城买棉被，经麻城、武汉回郑州了。

那时准备起义的主力营就是我在的那个营，营长张贞祥是西平县人。其余几个营的营长也都是河南人，一个是淮阳县槐店人，还有一个姓田，是泌阳人。那时河南省的省委书记，第一任是刘晋（现名吕文远），是确山竹沟人，一直在豫南领导游击队，后来是新四军和二野的副参谋长。解放后是林业部的副部长，后任河南省政协常委，现已离职了。过去也是西北军的一个营长，可能党史上也写有他。

到郑州后，到陇海铁路理帐室的马师爷那里，那里是河南省委的交通站，他是会计，叫马增煌，现叫马霓红，是师级干部，已离休。我把信交给他后，吕文远次日上午就到三元

里一个小旅馆找我。恐怕三元里已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时，我去几趟都未找着。吕约我到旅馆吃晚饭。这旅馆的名字忘记了，后来知道这旅馆是省委来往接头谈工作的机关。那时吃饭只有一个火锅子，无酒无菜，吃两个烧饼，主要是谈工作。谈的是1932年巩县兵工厂暴动失败，党组织破坏，党员有四、五个被捕了，还被杀了几个。那时兵工厂的负责人叫小何，名字不知道，是陕西人。吕对我交待：叫我利用是巩县人的条件，去找未暴露的三个党员，恢复组织。一个叫李震刚，是汜水人。还有一个姓张，一个姓白，都是石关人，让我以小何名义找他们。那时吕文远就化名李敬斋，我在家叫崔泽普。我回家有月余时间，在厂外找不到。后来就进厂当了小工，干些力气活，即装卸火车，这还是托我村在县当教科长的齐子平（齐文升）才当上了小工的。干小工两、三个月还没找到。

在这过程中，省委来了两个人，一个叫孙怀远，现在北京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他来两次，只在孝义住两天。有一次印象很深，就在孝义车站旁边饭摊喝豆腐汤，吃烧饼。那时讨饭的很多，我掰了半个烧饼给一个小孩。我们为这事还争论一番，他说：“你可别可怜这些流氓无产阶级，他们对党的破坏性可大啦”。我说：“这小孩才七八、十来岁有什么？流氓无产阶级也不都是坏的，也有改造好的嘛！”以后又去一个叫戴心用的，真名不知道。他说他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才回来，听口音像湖北人。戴来我家住了一个多月，以后这三个党员找不着。我想了个冒险的法子和戴商量，就是在兵工

厂工人上下班必走的西门告示牌上留一条子。写上三人的名字，写小何托我带给您一些东西，请在几日下班时，到大王沟万美斋杂货铺找我。万美斋掌柜叫靳清泉，是我姐夫的把兄弟。

这一冒险，果然成功，先找到了李震刚，后找到了姓张和姓白的。我是1933年11月底回巩县，到次年二月才算接通了关系，立即成立了小组，李当组长。这时候叫戴心田回郑州，我向省委写信汇报工作，提出我不能在巩停留的意见，因村里地主已经怀疑我了。吕文远和戴心田一同来到巩县兵工厂，我把关系交给戴，经吕的同意，我就走了。

我离开巩县的时候，是1934年6月，我到了瀛州阜，即现在的阜阳市。那是安徽省第三专员公署所在地。那时齐廷生在专署作密电室主任兼收发室主任。齐原来叫齐振玉，后在巩县地下党当区长时改叫廷生。我原是路过那里去看望他，他把我留在那里了。我原想去安庆找军警联合督察处长徐廷光，就是吉鸿昌政训处那个徐廷光。我想在哪里工作都一样。他介绍我到安徽第三中学当会计主任。三中也叫阜阳中学，是所完全中学。校长陈沂，也叫陈浴春，是巩县益家窝人，复旦大学毕业后曾留过日。那时阜阳中学好多河南人。有赵建树是泌阳人；陶东知是现文委对外副主任，也是以前文化部副部长王阆西老婆陶莲的父亲。王也是河南人，陶莲现在还在。陶东知在那里作总务主任，我作会计主任，五间房我住东头，他住西头。那时我们地下党的书记叫高原，刘贯一做宣传部长。刘贯一曾任山西省副省长，现在中央组织部

招待所。当时皖北九个县暴动，我们有一个营，被敌人一个师镇压下去了，党的组织全被破坏，高原和刘贯一跑到开封。那时候鹿钟麟是河南省主席，高、刘一到开封就被捕了。高的老婆叫刘佩霞，是信阳人，是有名的“母老虎”，泼泼辣辣，也是地下党员。她在开封大街上揽住鹿钟麟的汽车喊冤，这样把高、刘救了出来。刘佩霞现在济南住，高已经死了。刘贯一在，文化大革命中整得他也够呛的。此后皖北已无地下党组织了，我就直接和河南吕文远联系。往来通信都是通过前边说的马师爷。

关于在巩县兵工厂与李震刚接运关系后，他给我介绍一些情况。兵工厂工人暴动后，国民党出动一个团，后来增至一个师进行镇压，被抓走在开封枪毙的有五个。枪厂的比较多。那时党员最多时，大概是十二或十六个，李震刚是支部书记，是比较老的党员。姓张和姓白的党员入党才一年，所以没有暴露。李比较老练，抓的几个都是出头露面的，也跑了二三个，是白沙的。恐怕巩县的党，还是兵工厂较早，那时农村好象没有党的组织。

我不能在家呆，一方面因为孙怀远、戴心田去我家都是长袍大褂戴礼帽，不像乡里人；另一方面我召集几个穷些的同学开过几次会，作了些宣传工作，我曾写过“山头一只虎，名叫傅寅午（大地主）”，他怀疑我；再加上我曾动员学生扒神像，念阿弥陀佛的家伙骂我：“这孩子将来非吃炮子不可。”我父亲也怀疑我，一天晚上和我谈话：“经常来咱家的是哪里的？干什么的？”我说：“是老朋友。”他说：

“那你们见面为什么还不认识？”我说：“人太多了，时间长了，象那个戴心田才从东北义勇军回来，像貌都变了。”那天晚我父亲谈的时间比较长，他说：“人家都说你在学校里是比较好的学生，你看你的同学××当了科长，××当了营长，××当了秘书，你这几年干的什么呀！回来连路费都没有！”我就说：“你别看他们有钱，当了官，买了地，将来这些都有咱的一份。”他说我瞎吹，就发火啦。1951年土改后，我在山东当分区政委，他去了，我问他分了多少地？他说是18亩，我说：“这都是谁家的？不是有咱一份吗？”他好半天才回答说：“现在村里人都说，你这孩子还有眼光。”

关于张绍珍这个人我不认识，那时见面都是老张老李的。像李震刚大概在1959年或60年我碰见了他的儿子，是在一个驻埃及大使老同志家碰上的，那时候李震刚住在万寿路廊坊店，据说文革中死了。他儿子叫李奈，原在公安部当处长，“四人帮”砸烂公、检、法时被整下放了。

关于小何，我没见过这个人。因为我去巩县时，吕文远就告诉我说，暴动失败后他就跑了。他向省委提出要回陕西，未批准，最后还是走了，估计回陕西了。吕还告诉我小何在杨虎城部下冯定斋军里，干什么，不知道。所以小何的名字也不知道，那时见面都是老啥或小啥，互不问真姓名。

我和巩县人在一块的很少，只在皖北碰上齐廷生，1935年在那里介绍他入党，1935年10月底省委机关被破坏后，和吕文远失去了联系。那时组织部长是郑文卿，现在是北京政

法学院党委副书记。宣传科长是刘顺远，就是原江苏的省委书记。我到1935年春节回家，因几个月和省委联系不上，到郑州才知道省委被破坏了，那时马寔红还在郑州，知道吕文远和郑文卿跑到上海去了。春节去后，我到上海找，找不到。就到复旦大学、交通大学找到黄远，他是复旦大学学生会长，所以就留下搞学生运动。学生毕了业，没有职业，就在一块办报。办《新声晚报》，搞了半年被国民党封了，就决定去延安。一到西安就发生了“西安事变”。也没有路费了。释放蒋介石的第二天，我把大衣当了八块钱，又回到巩县家里，弄了钱才到了延安，这是1937年。到延安又重新入党啦，因那时我已没有组织关系了。一直到1947年碰上郑文卿，又知道了吕文远，才恢复了前一段的组织关系。那时候党的关系一人出了问题，线一断就完了。

1983年11月23日

〔注〕 崔济民，男，1912年生，巩县康店乡山头村人。原任农业部土地利用局副局长，现任顾问。

回忆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 皮、徐支队进军豫西活动的情况

史向生口述 梁济文整理

一九四四年，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成了强弩之末，他们为了进行垂死的挣扎，四、五月间，发动了豫西战役，占领了郑州、洛阳等地。国民党汤恩伯几十万大军，不战而溃，逃到南阳、伏牛山和陕西去。短短数十天内，郑州、洛阳、豫西三十八个县的广大区域沦于敌手。本来已深受水、旱、蝗、汤（汤恩伯匪军）四大灾害，处于苦难深重的豫西人民，又惨遭日寇铁蹄的蹂躏。

六月底，党中央就对开辟河南工作有了指示，准备由太行、太岳区抽出部队到豫西去。七月廿五日，中央发布了向河南敌后进军的命令，决定由我八路军太行山根据地抽出一部分兵力深入豫西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并决定首先在豫北扫清敌伪武装，为我军进入豫西创造条件。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决定由皮定钧、徐子荣同志为首组成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皮定钧为司令员，徐子荣为政委，方升普为副司令员，郭林祥为政治部主任，熊心乐为参谋长。同时组织了豫

西地委，徐子荣为地委书记，史向生为组织部长，孔祥祯为宣传部长（后兼统战部长），皮定钧、方升普郭林祥为地委常委。部队在林县集结整编，组成两个主力团，三团团长钟发生，政委陈行庚；35团团团长王诚汉，政委马毅之，共一千多人，准备进军豫西。还在太行区各地委抽调出家在豫西的三十多位县、区地方干部，随军进入豫西做开辟工作。

在这期间，太岳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为配合部队进军豫西，专门组织了部队到豫北出击敌人，为我军进军豫西扫清道路。太岳军区抽调刘聚奎、杨蔚屏组成豫北前线指挥部（地点在杜八联、杜年庄），率阎学胜十八团下山开辟济源县，扫清敌顽武装，拔除陈岭敌人据点，促成地下党掌握的当时接受敌人番号伪军马明山起义，解放了“杜八联”。马明山起义的方式是借着为马明山作生日，请陈岭据点的鬼子小队长等四人赴宴，我们预先化装埋伏，举杯为号，把四个日本人活活捉住，这就是有名的“鱼饵宴”，随即成立了“杜八联”抗日区政府。八月份，太岳区派五十九团张春生带少数武装，偷渡到黄河南岸，在新安一带进行侦察活动，摸清黄河南岸敌伪的情况。

因为我是济源县“杜八联”人，抗战初期在那里组织过武装，当过县委书记，后又在晋豫边区工作过，地方和人事都比较熟悉，所以地委和司令部决定让我组织带领一个先遣工作队，沿太行山，由太行到太岳，先到黄河边研究筹备渡河事宜。皮定钧、徐子荣同志亲自给我谈了任务，并让我带了几千万元伪币，要我采取一切手段，作好渡河准备工作。

八月中旬，我们先遣工作队从林县出发，秘密经过敌占区到阳城唐天际晋豫边司令部接洽渡河到豫西的事宜，了解豫北形势和制订大部队渡河的计划。这支先遣工作队共三十余人，包括十几个地方干部，十几个情报、侦察人员。我们都穿着便衣，我带了一位警卫员，还有一匹牲口，经过陵川、晋（城）东、晋（城）西地区，沿河南、山西交界的太行山山沟小道，通过白晋公路和沁河，连续七天七夜，通过了敌占区，于九月初赶到了阳城晋豫边唐天际司令部所在地。那时正是“水、旱、蝗、汤”四大灾害时候，途中所见所闻，惨不忍睹。许多老百姓家一家老小全被饿死，死尸还躺在炕上，几个月无人掩埋。有一个小村子，竟无一人，老蒿一人多深，到处荒无人烟，野狼成群，非常凄惨。到阳城后，我们见到了唐天际司令员，他们介绍了情况，洽商了任务，制定了渡河计划。随即，我们就赶回济源“杜八联”杜年庄的前线指挥部，和司令员刘聚奎、地委杨蔚屏接上头，谈了豫北的情况和渡河计划。同时，我在杨大庄马明山的团部见到了“杜八联”地下党老战友杨廷佑、程远谋、杜远礼等许多熟悉的同志，了解了“杜八联”解放的情况，知道“杜八联”东边坡头镇还住着卫安等伪军，还不断打仗。还了解到黄河以南和豫西的有关情况。他们介绍了在孟津城、南河清口、横水的长洼等地都建有情报工作。我们在前线指挥部同杨廷佑、程远谋同志共同研究如何进军豫西的筹备计划。会上分析情况是：蓼坞、河清口两个黄河渡口我们都掌握了，黄河南岸的南河清口村上层士绅同我们有联系，可以给我们

贡献情报，掩护我们的人员；南河清口驻扎一个连的伪军保安队把守，通过当地上层士绅可以控制他们，所以渡河点决定放在“杜八联”的河清口。分析这些情况后，认为黄河南北渡河点没有问题，而主要的是没有直接掌握渡河的船只。当时研究方案中，一个是葫芦，再一个是用油包，但只能过少数人，不适宜大部队渡河，于是决定用一切办法搞船只。后来在蓼坞搞到了两条船，又在坡头镇偷来了两条船，共四条船。船破，就连夜找人修理。同时，我们组织河清口，蓼坞两村原来的老水手进行训练、分工，特别是让可靠的老水手当梢公掌舵，并配有后备力量。我还同他们一同座谈，亲自动员，鼓舞大伙的士气，还要求他们严格保密。为了直接掌握黄河南岸的情况和敌人兵力部署以及地形等，又派我带来的侦察科长，配合当地人员先用油包潜渡黄河，到南河清口和孟津县城直接了解敌人的动态。

渡河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后，经过唐天际司令部向皮定钧、徐子荣发出了电报。皮、徐即率领全部豫西抗日先遣支队人马，浩浩荡荡连续急行军，通过阳城到达了黄河边“杜八联”河清口渡口。先两天我们还派工作队的杨桂林同志到阳城的路上迎接部队。皮定钧、徐子荣在河清口见到我们后，我们汇报了渡河准备的情况，他们非常高兴。皮司令员亲自鼓励水手们，还把部队带的酒送给水手们，随即召集团长和直属单位的干部开会，确定分船分批渡河任务。之后，即下令开船渡河，这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一日。渡河部队的第一船由方升普副司令员亲自率领，首先渡河。他们顺利

渡过黄河后，跑步登上邙山岭，烧起三堆大火，表示安全到达南岸。接着，大部队一船又一船地连续抢渡，一直渡到天明。那天夜里，皮定钧同志因十分疲劳，在布置好渡河任务后，就在河清口饭铺门口的一块石板上展开铺盖，痛痛快快地睡下了。黎明，最后第二船，我和皮定钧同志一起渡河。我们登上船头，向一直在河岸给我们送行的程远谋、杜元礼以及“杜八联”支援我们渡河的同志们告别。

部队到了黄河南岸，一下船，踏上豫西的土地，全体指战员都非常兴奋、活跃。通过敌人层层封锁，安全地渡过了黄河天险，心里感到特别轻松，飞跃地前进了。过河后，天刚明，在南河清口的村边，地方保安团和一些进步士绅们整整齐齐地迎接我们。皮司令员把他们叫来说：“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你要打我，我非打你不可。”“我们还有后续部队过河……”同时要我出面和他们订上几条书面协议，让他们保证今后和八路军一起，共同抗日。只要八路军渡黄河，决不阻挠，并要积极支援等等。接着，我们部队就飞快跨上邙山岭，迅速前进。只在通过孟津横水镇时，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我们的队伍，向我们打了机关枪，但我们也很快地通过了。

这时，我带的先遣工作队与随军来的工作队也汇合了。许毅是组长，封中斌是副组长，把他们带的干部简历表都交给了我（后来交给张思贤同志保存在伊川县）。当即，我和徐子荣研究：把卢嵩隐蔽在孟津马屯他的家乡；封中斌扮成小商贩也隐蔽在那里，作为联络；把郭琛和李湘隐蔽到洛阳